

桐江学术丛书

王 伟 著

文本作为交往的世界：

# 接受美学主体间性思想研究

Wenben Zuowei Jiaowang de Shijie:  
Jieshou Meixue Zhuti Jianxing Sixiang Yanjiu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桐江学术丛书

Wenben Zuowei Jiaowang de Shijie:  
Jieshou Meixue Zhuti Jianxing Sixiang Yanjiu

文本作为交往的世界：  
接受美学主体间性思想研究

王 伟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文本作为交往的世界：接受美学主体间性思想研究 /  
王伟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495-5340-2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接受美学—研究 IV.  
①B83-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4 ) 第078155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服务电话：0771-2092860  
广西南宁华侨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广西南宁市北湖南路20号 邮政编码：530001 )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15.5 字数：230千字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序一

杨春时

王伟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他天资聪颖，勤学好问，成绩优秀。在学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 I 讲授的主体间性美学理论，深有领会。王伟的毕业论文也是用主体间性理论阐释接受美学，这个学位论文在答辩会上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毕业至今，王伟潜心治学，不断深化对接受美学的研究，成果最终成书出版。作为他的导师，我深为青年学子的成长而高兴。

接受美学是一门重要的美学理论，它既继承了解释学的思想路线，扭转了传统美学重视创造、忽视文本接受的偏向，又克服了把文本孤立起来、使意义客观化的结构主义偏向，而把艺术接受当作一种主体间性的、创造性的活动。运用了前沿的理论，必然获得新的研究成果。作者以主体间性理论阐释接受美学，使其“文本是准主体”、“文本作为交往的世界”思想得到了深刻的理论揭示。但是，作者并没有机械套用主体间性的阐释框架，而是从具体文本出发，考察接受美学诸家的思想脉络和理论构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可以看出，作者着实下了一番“笨功夫”，他运用多方管道搜集资料，仔细爬梳前人研究成果，进而做出充实、细致的论证。在学风浮躁的环境中，作者这一治学态度和方法尤其值得肯定和提倡。

作者目光并没有停留在对接受美学文本的知识考古上，而是在知识社会学的更高站位上依循卡尔·曼海姆之“思想的社会学概念”的追索方式，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审视接受美学的学术旅行及其映射的翻译政治。作者敏锐地察觉到接受美学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精神的变迁（如艺术形式更迭、媒介生态转换、地缘政治影响、历史文化地层等）存有繁复多变的互文关系。通过对几场具有指标意义之学术论



争的细致梳理，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自从姚斯以《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鸣惊人、开宗立派，接受美学就与其他阵营的学者（涵盖左翼/右翼、激进/保守、现代/后现代等学术光谱）展开激烈论战、对话，积极参与现代性公共论述空间的整体建构，在调整改进、丰富完善自身的同时，也深刻改写了学术关系网络与未来发展走向，真实映射了“学术场域”话语权的多方竞逐与位移转换。正是在关系主义的建构视角上，作者令人信服地指出，“接受美学的兴与衰、浮与沉，是和世界大背景和学科小气候密切关联，充分体现了历史征召英雄。”

总的来说，作者问题意识清晰明确，没有止步于描述接受美学“说什么”，而是将问题的探讨延展到其“怎样说”和“为什么说”，而这一直抵理论坚核的学术追求，赋予该书相当程度的学理意义与实践价值。诚如文中所反复提示的那样，接受美学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互相激荡之多元语境中的演变发展，尤其值得挣扎在“后理论时代”（其表征为“理论终结”）之汉语美学界的重视，毕竟二者都曾经或者正在面临着近乎相同的时代困窘，即理论未及建构便面临着后现代主义的无情解构。不宁唯是，作者还重返历史语境，基于跨文化的传播视野，指陈接受美学家所提倡的交往理念与对话精神，能够更好地诠释“文化间性”的基本意涵，有利于消解自我/他者、历史/当下、传统/现代等诸种二元对立，最终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话语迷思。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匠心独具地挖掘晚期接受美学在大众传媒兴起的时代语境中关于身体经验的前瞻性论述，进而以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与姚斯的审美经验论转向为例，指出其亦为勘探当下审美文化现象（如粉丝文化、怀旧消费、历史记忆等），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妥帖的切入视角。从本书可以看出，作者并非一个困于书斋内的冬烘学究，而是具有浓厚的现实关怀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学者。略感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合理设想未能充分展开，论述上稍显薄弱。希望在来日修订之时，作者能够结合具体案例深化补充之，以臻于完善。

2014年3月16日于厦大



## 序二

周云龙

那时候，一切都很美好。

手边的这份书稿，总是让我回想起那时候。那时候，大家每天都静静地躲在浓荫覆盖的厦大后山上的凌云公寓里读书、写作，过得单调而单纯。王伟兄正师从国内“后实践美学”领军人物杨春时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我则挂在戏剧学名下胡混。两人从事的领域好似一个是天，一个是地，本没有什么交集。但每天上午11点、下午5点，在凉爽、安静的芙蓉自助餐厅二楼，彼此总是能够碰面。时间久了，也就相识了。

每天到餐厅的时间还是没有改变，但用餐的过程却成了一次次名副其实的“会饮”——饮食成了一件很知性的事情。毕业后的今天，在外面用餐的机会会有很多，才明白那时候那份也许有些酸腐的知性是多么难得。彼此交谈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读书、写作方面，因为大家都在准备学位论文。每次“会饮”结束，又匆匆赶回公寓，重新修正、发展既有的思路。这种碰撞使彼此发觉，两个原本似乎没有太多交集的领域，其实原本就没有太多的畛域。

火红的凤凰花在浓荫中肆无忌惮地一片片燃烧起来。大家按照学制的框范，乖乖地按时整齐排列在凤凰树下，在毕业照的镜头前微笑了一下，就各自匆匆打包，捧着既轻又重的学位证书离去……我北上到了福州，王伟兄则回到了那个胸怀锦绣的闽南小城，也是他的故乡——泉州，大家还是同行，都在高校任教。然后，各自分别开始了琐碎忙碌、一地鸡毛式的平常日子。除了偶尔的电联问候，一直未能有时间晤面。

若干年后，再次遇到王伟兄，发觉他的语速已不似从前那么峻急，变得舒缓许多，眼神也笃定起来。但不变的是他身上那种美好的学人本色——依然谦逊敏锐，谈吐不俗。



在我看来，当下汉语学界关于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大抵存有两种截然相反甚或针锋相对的研究范式：一是从上到下的逻辑演绎法，还有就是自下而上的经验归纳法。前者以水银泻地般的“思想性”见长，后者以“用证据说话”的实证性取胜。两峰对峙、双水分流的局面，往往带来各执一端、各擅胜场的后果，在敞开问题的某一面相的时刻，又悄然遮蔽了另一维面。我们不禁要反躬自问，能否在“心之真”与“理之辩”、宏观把握与个案分析之间，寻找到另一个立足点，超越“学术消费”或“消费学术”的观念形态雾障与资本逻辑宰制，由点带面、小中见大地重新解析主体间性美学思想的历史脉络？眼前这本关于接受美学的研究专著，就体现了作为初生之犊的年轻学者王伟，在这一领域的锐意尝试和美学运思。

在今天研究接受美学，无疑是一件危险的工作——这个选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被掘地三尺，如今究竟还有多少新意可淘，着实考验着论者的学术眼界。但研读王伟兄的大作后，才发现他翻新出奇的高超功力。这本专著至少有两大亮点相当瞩目：一、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上，王伟兄以动态的眼光追溯了接受美学思想在当下的流变、延伸以及与其他美学思想的整合、变体，就其完整性、全面性而言，目前尚不多见；二、在研究观念的更新上，王伟兄把“沟通行动理论”带入接受美学，进行哲学层面的间性解析，这应该是该专著最具深度的层面。从作者中心到读者中心，再到消解中心、间性沟通，这一分析路径事实上与当代最关键的命题之一，即不同文明、族群间跨文化对话的前沿思考暗合。这也是该专著最核心的问题意识。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作者既直接面对文本本身，又立足时代的地平线，用心倾听研究对象的“说”与“可能之说”，从而有效避免在观照对象之时为玄思而眩晕，并且经由“空白”的“填补”、“断裂”的“消弭”、“视阈”的“融合”，水到渠成、合乎逻辑地呈现出“文本作为交往的世界”这一论说主旨。联想到本土文论面临着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深刻转型，众声喧哗、看似热闹，实则却各说各话、自娱自乐，彼此间缺乏平等对话的意愿与能力。唯愿该著的问题、观念和方法，或能够对当下胶柱鼓瑟式的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启迪。

博士论文是一位学者终生工作的起点，此后无论是因循衍延还是改道易辙，都能从中找到因由端倪。王伟兄近年更多关注闽南剧艺的海外传播，硕果累累，步步莲花，其实全拜这篇学风扎实、视野开阔的博士论文（本书前身）所赐。其中的放送接收、文化间性、地方性知识的媒介播迁等问题，无不需要回归到文本的“交往世界”这个原初场域的权力结构中加以辨析。而我一直都在比较研究领域中发梦并发懵，时时陷入问题与方法的困境无法抽身。

当我们把两种或多种文化并置在一起，或者把它们纳入某种“关系”，探讨彼此间的

异同或呼应时，总是无法避免一种“A $\longleftrightarrow$ B”式的二元格局。在1971年的一次对谈中，德里达曾表达过一个广为引用的观点：“要认识到在古典哲学的对立中，我们所处理的不是面对面的和平共处，而是一个强暴的等级制。在两个术语中，一个支配着另一个（在价值论上、在逻辑上，等等），或者有着高高在上的权威。”因此，在一般的比较文化研究中，前述二元格局的权力级差已成为考验我们学术眼界的一个重要尺度。对此，常见的反应有两种。一种是以二元格局中较为强势的一方作为评估异文化的基本参照，在理论前提上预设一个一元的、普遍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作为其他文化的未来愿景和发展模板。这一反应常常发生在西方与非西方遭遇的历史时刻，西方文化借助其海外拓殖的历史，在非西方世界的心智层面深深地植入了其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并为后者留下了沉重的文化包袱。

随着多元主义理论的兴起，另一种反应以充满挑战的姿态，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以地方性文化为基点，反向评估、甚至质疑二元格局中的强势文化的普遍性，进而论述地方性文化的独特意义与价值。第二种反应源自否定的激情，它试图对第一种反应提出批评和拒绝。但是，在激情的背后，它仍然和第一种反应分享了同一个理论前提，即边缘和中心的二元区隔。在第二种反应里面，地方性文化虽然得到了承认和展示，但被忽略的问题则是：地方性文化需要谁的承认？为什么需要其承认？答案一目了然，即作为地方性文化对立面的强势文化。在这一文化“比较”方案中，地方性文化落入了相对主义的陷阱，它假设自身是超越历史的、静态的、完成的文化模式。这一假设事实上支持了强势文化的普遍性地位，因为地方性文化（不）自觉地把自身设置为其对立面，并未对它们所共处的话语结构构成任何挑战，从而使地方性文化成为“普遍—特殊”模式中“特殊”的一极。在这一过程中，“A $\longleftrightarrow$ B”式的二元格局事实上更加稳固了。甚至可以想象，在多元主义的理论预设下论证地方性文化特殊性的实践，其实也是自我否定的，因为它深刻地复制了原本属于强势文化的运作机制，它本身就是否定边缘的。在其心智层面，同样存在着成为“中心”的渴念，而所谓的“多元”不过是“一元”的改头换面。

第二种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比第一种反应更加可怕，因为它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和合法的表象，可以掩盖其伪善和危险的一面。这就是当下的比较文化研究面临的两难困境。具体到中国的比较研究，就方法而言，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再次全面启动，“旅行”到了中国本土。因其激进凌厉的理论锋芒和道义力量旋即成为理论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并成为比较研究中的首选理论方法。但不无讽刺的是，正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范例的开启者赛义德，早在1982年发表于Raritan Quarterly的文章 *Traveling Theory* 中，就告诫人们，理



论与观念是情境的一部分，其意义将随着情境的改变而变异，因此，“如果不加批判地、重复性地、不加限制地使用一种理论，其（原有的）洞见可能成为陷阱。”事实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旅行”到中国以后，不仅构成了一个 G.C. 斯皮瓦克所谓的“新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陷阱，而且加深了上文所描述的比较文化研究面临的两难困境。

那么，我们该如何将中国立场与那些后殖民国家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区别开来？如何才能够不再假设敌意或对立，找到“A $\longleftrightarrow$ B”式的二元文化比较格局之外的空间或立场？在王伟兄对接受美学的主体间性相关思考中，我看到了进一步思考这些问题的诸多可能。经过层层铺垫，严谨论证，王伟兄在大作最后，给出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论述：文本意义是由接受者参与生产而成的，而非信息的发送者强行传递，故而文本的生产者和传送者的解释，只是诸种解释中的一种，并不天然地具有特权地位，更不能替代或者等同于接受者自己的解释，后者既可以赞同也能够反对，或者“在赞同中反对”，在“反对中赞同”。是故，读者终于可以堂而皇之的摆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被动形象和属下地位，与传播者一道共同分享作为传播主体的荣光。

王伟兄的大作即将出版，里面的文字早已读过，如今重读，仿似昨日重现。祝贺之余，也感谢王伟兄提供机会，让我在纷扰凌乱的当下重拾记忆的碎片。那时候，一切多么美好！

2014 年 3 月，福州，上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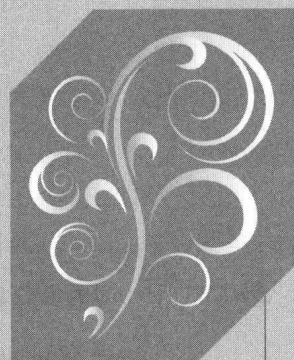
# 目 录

##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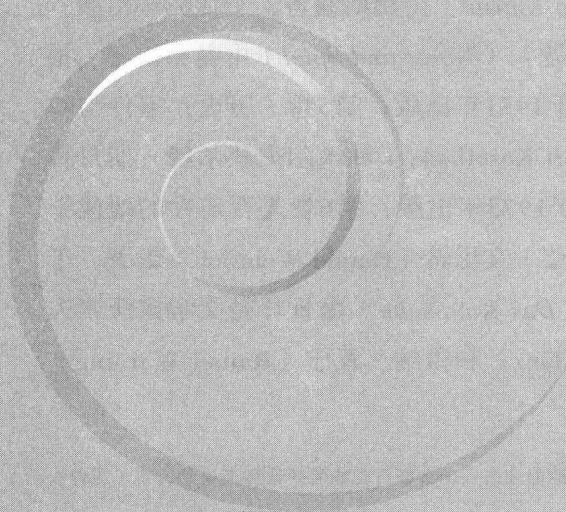
|     |                                 |
|-----|---------------------------------|
| 001 | <b>第一章 绪 论</b>                  |
| 002 | 第一节 接受美学之译介研究综述                 |
| 017 | 第二节 本书的撰写缘起、研究方法、架构意义           |
| 023 | <b>第二章 存在论“主体间性”的审美主义倾向</b>     |
| 025 | 第一节 交往的问题域                      |
| 035 | 第二节 交往中的主体间性问题                  |
| 045 | 第三节 完整的接受美学的实质是主体间性基础上的<br>交往美学 |
| 049 | <b>第三章 主体间性的审美反应文论</b>          |
| 051 | 第一节 “暗隐的读者”的主体间性                |
| 059 | 第二节 主体间性的文学文本观                  |
| 068 | 第三节 主体间性的阅读现象学                  |
| 082 | 第四节 文本与读者的主体间性交往                |
| 097 | <b>第四章 从效应美学到虚构诗学</b>           |
| 098 | 第一节 审美反应理论的不足之处及其调整应对           |
| 104 | 第二节 迈向主体间性的文学人类学                |
| 119 | <b>第五章 文学史作为主体间性的建构</b>         |
| 120 | 第一节 文学史传统范式的省思检视                |
| 133 | 第二节 接受文学史主体间性的七点论纲              |
| 146 | 第三节 接受文学史主体间性的再审视               |



|     |                            |
|-----|----------------------------|
| 157 | <b>第六章 主体间性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b>  |
| 158 | 第一节 审美经验的主体间性              |
| 166 | 第二节 主体间性的审美认同模式            |
| 174 | 第三节 主体间性的文学解释学方法论          |
| 181 | <b>第七章 主体间性接受美学与新兴传媒文化</b> |
| 183 | 第一节 接受研究中的大众文化             |
| 188 | 第二节 大众传媒文化批判的批判            |
| 219 | <b>参考文献</b>                |
| 230 | <b>后 记</b>                 |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接受美学之译介研究综述

### 一、接受美学的汉译和介绍

在跨文化交往语境中,学术的交流拓展有赖于翻译的传播推广。但笔者在考察大陆学界对“康斯坦茨学派”(Kanstanzer Rezeptionsathetik)之研究专著前,须不无遗憾地指出,其在内地理论界只是受到“旅游观光客式的热热烈欢迎”<sup>①</sup>,毕竟该学派的重要研究成果,将近6000页之巨的《诗学与阐释学》丛书12卷,至今仍无中译本刊行,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也不可能面世,缘此客观上限制境内学人的学术视阈。具体而言,这套由慕尼黑的芬克费拉格出版社发行的系列出版物,是康斯坦茨跨学科小组每隔两年举办一次之学术研讨会的成果汇集,其学术史价值引起德语知识界的巨大关注,以至于将其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瓦尔堡文库相提并论。其各卷标题名称,现略述如下:第1卷《模仿与幻想》(*Nachahmung and Illusion*)由姚斯(Hans Robert Jauss)编著,于1964年出版;第2卷《内在美学—审美反映:作为现代诗范例的抒情诗》(*Immanente Asthetik—Asthetische Reflexion*)由伊瑟尔(Wolfgang Iser)编著,于1966年出版;第3卷《再也不美的艺术:审美的边界现象》(*Die Nicht mehr schonen Kunste*)由姚斯编著,于1968年出版;第4卷《恐怖与游戏:神话的接受问题》(*Terror und Spiel*)由曼弗雷德·福尔曼(Manfred Fuhrmann)编著,于1971年出版;第5卷《历史:事件与叙述》由雷茵哈特·考瑟尔莱(Reihart Koselleck)和沃尔夫狄尔特·斯丹普尔(Wolf-Dieter Stempel)编著,于1973年出版;第6卷《否定性的地位》(*Positionen der Negativitat*)由哈罗德·文里希(Harald Weinrich)编著,于1975年出版;第7卷《滑稽之物》(*Das Komische*)由日耳曼文学家沃尔夫冈·普莱森丹茨(Wolfgang Preisendanz)和雷纳·瓦宁(Rainer Warning)

---

<sup>①</sup>李包靖:《用颤抖的双手撑起具有神圣风险的未来——布鲁门贝格的神话终末论》,载《国外文学》2009年第1期,第10页。

编著，于1976年出版；第8卷《同一性》（*Identität*）由奥多·马库厄（Odo Marquard）和卡尔涅茨·斯梯尔（Karlheinz Stierle）编著，于1979年出版；第9卷《文本与运用：阐释学话语中的神学、法学和文学研究》（*Text und Applikation*）由曼弗雷德·福尔曼编著，于1981年出版；第10卷《虚构之物的作用》；第11卷《话语》，第12卷《时代界限与时代意识》。

而我国第一本接受美学译著《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是由周宁和金元浦先生共同翻译的。该书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上部是接受美学创始人、曾任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教授的姚斯所著《走向接受美学》英文本（*Toward an Aesthetics of Reception*, 1982）；下部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R.C.霍拉勃（Robert Charles Holub）先生对接受美学之批判性的研究著作《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84）。“前一部是接受美学的经典著作，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接受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后一部著作则是对接受美学的产生条件、基本理论、发展过程、自身价值以及所产生的影响的全面介绍和分析，人们可以从中看到接受美学的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和整体面貌。”<sup>①</sup>现在看来，此书作为李泽厚主编之《美学译文丛书》的当中一册影响极大，几近成为内地高校中文系研究生的必读书目，从而为推动接受理论在汉语学术界的广泛传播厥功至伟。实而言之，不少学人得益于斯，方能直接阅读接受美学代表译著，也才能对其思想渊源、理论概貌、争鸣流变有一个比较明晰的系统认识。

当然所录两书不同，故而应分而言之。首先，《走向接受美学》一书，收入了姚斯得以成名、流泽广远的被奉为接受理论宣言书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作为长篇修订稿，该文比作为1970年秋季文学史研讨会论文集集中的一篇而刊发在《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二卷第一期的同名论文还要完整，后者实际上只是截取1967年原文的第五到第十二部分。当然除了这篇让姚斯扬名立万、备受瞩目的宏论雄文，该书还收集其利用接受美学作为理论工具，来对艺术史、类型理论进行具体操作实验的数篇论文。不过对照该书的英文本，汉译本也存在着白璧微瑕，其将姚斯访学耶鲁大学的引进者、德里达的

<sup>①</sup>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出版者前言》，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至交密友、被誉为“耶鲁四才子”之一的著名解构主义提倡者和传播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所作的导读给去掉了，从而让国内部分学者不免忽视了与其同时起步且更为炙手可热的解构主义文论与其之间的共享语境和话语异同。事实上，时至今日，接受理论在北美的撒播异变及其余波回响，和当代后学的阅读理论之某种若即若离、似有还无的微妙关系，在汉语学界仍然是一块有待开垦、杂草丛生的荒地。

此外，刘小枫编选的《接受美学译文集》，作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创办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的一册，由三联书店于1989年出版。该书除了节译姚斯的力作《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一书的两个小小节目，即《什么叫审美经验？》、《审美经验的接受方面》之外，还选译几篇接受美学研究的论文。当中深受国内学者重视而引用频次相对较高的是由罗悌伦翻译的冈特·格里姆（Gunter Grimm）《接受美学研究概论》。颇具篇幅的该文选自其所编著的《文学与读者》一书，上篇涉及社会利益、解释学前提、接受美学的萌芽、姚斯的接受美学、姚斯萌芽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姚斯批判的批判等诸多方面的概论，而下篇则触及文学功能确定、文本理论、美学与出版、历史上的接受学研究（效果史）、构想的读者、文学社会学与经验的接受学研究等诸多维面的阐述。从中不仅可以见出接受美学的出现缘起、理论准备，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主张及其运动的历史意义、价值地位等，而且能够看到处在中心漩涡中的德国学者对其不足之处的反思批判和对薄弱环节的深度拓展，对国内学者特别具有参考价值。

张廷琛选编的薄薄小册子《接受理论》除了遵循惯例收录姚斯的《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接受美学与文学交流》，伊瑟尔《文本与读者的相互作用》，还选译了读者反应批评的两篇文章，以及摘译了国外批评家对文学接受理论的批评，尽管只是述旨备要的只言片语，但也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由刘峰等人编辑、翻译，作为《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读者反应批评》，当中的“译文除尧斯的《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外，均选自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980年出版的《读者反应批评：从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一书”。<sup>①</sup>需要指出的是，姚斯那篇所谓的接受美学“宣言”，是根据德文本译出的，而此前的中译文都是根据英文本翻译，与原文相比有一定的出入，因为作者曾做了某些修

<sup>①</sup> 简·汤普金斯：《读者反应批评》，刘峰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1页。

改。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有些重要的文章被人为地删减调换，如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的《阐释集注本》（*Interpreting the Variorum*）就被遗忘在编选视线之外。

20世纪90年代，接受理论的传播更趋深入，也更加广阔，除了原本较热络的欧陆接受美学，还延伸至此前相对冷淡的北美读者反应理论。有趣的是，伊瑟尔前期文论思想的扛鼎之作*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曾被费什心怀羡慕地提为“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销售榜上仅次于德里达的《论书写》”，就有三个中译本：其一是金元浦、周宁先生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的译出，其同时也作为李泽厚先生主持的《美学译文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书名为《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其二是金惠敏、张云鹏、张颖、易晓明的译本，作为《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译文系列）》，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书名为《阅读行为》；其三是由霍桂恒、李宝彦根据英国伦敦卢特莱支和吉甘保罗出版社1978年版所翻译的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书名为《审美过程研究——阅读活动：审美响应理论》。

姚斯后期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其在“康斯坦茨学派”理论建立十周年之际先行推出的重磅力作*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Hermeneutics*，翻译情况也很复杂。这是因为姚斯本来打算将这部鸿篇巨制分为两个部分，上卷着重论述审美经验及其历史演变的各个方面，下卷则重点研讨在阅读文本进程中之问答逻辑及其在理解、解释历史经验中的运用问题，也即通过与文学研究的实际结合，而进一步具体化阐述审美经验，从而深化文学解释学诸多维面的论述。然而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仍然是其上卷部分。具体来讲，复旦大学的朱立元先生根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82年英文版（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所翻译出的《审美经验论》，实际上是该书的上卷的第一部分，由作家出版社作为《作家参考丛书》1992年2月出版。此外，顾建光、顾静宇、张乐天根据上述英译本所译出的《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较之前者多了《与主人公认同的互动模式》、《论戏剧主角之逗人发笑》、《论古代和现代抒情诗的“结构同一性”问题》、《“家的温馨”：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交流模型的1885年抒情诗》这四个部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出版，并于2006年4月再版。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顾老师等人的译文虽然精雕细琢，但仍有





地方需要做出某些说明。比如其将Pop art直接翻译成“流行艺术”<sup>①</sup>，似乎有所不妥，如能采用更为常用的音译“波普艺术”，可能更为明白晓畅，不然那些不熟悉英文本的国内读者，或许会产生某种疑惑误会，即间或联想起姚斯在反驳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之后，在阐述审美经验之生产方面的关键时候，不惜花费一定篇幅论及所谓的流行艺术，其究竟所为何物呢？再有，其将弗洛伊德的“升华”译成“进步”<sup>②</sup>，“压抑”翻成“倒退”<sup>③</sup>，似乎造成普通读者的理解难度，毕竟弗洛伊德美学在此书中被姚斯多次引用，作为其后期关于审美经验交流功能之建构论述的重要思想资源。

程锡麟、王晓路、林必果、武厚恺翻译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新文学史》主编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集合当代西方顶尖文论家编撰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收录姚斯的《我的祸福史：文学研究中的一场范例变化》和伊瑟尔的《走向文学人类学》一文。这两篇论文的作用不容小觑，其对接受美学的中国研究者来说相当重要。先说前者，姚斯回顾接受美学历经风雨而茁壮成长的发展历程，其中关于如何绕开原有学科建制而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感言，尤其能够引起国内热心文化研究、提倡文化间性之年轻学者的深切共鸣。后一篇论文则体现已是暮年的伊瑟尔，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对其早期文论思想的重新认知和最新调整，即从《隐在的读者》、《阅读活动》中局促于文本在文学交往中的审美效应，转而全面拥抱人类之审美感性的生成，提出迈向主体间性文学人类学的历史目标，即主张“在一个人的意识中，他并不放弃他所认为的他自己，但同时他又作为另一人物而出现——这是人类的一个基本需要，他认为文学虚构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 this 需要”<sup>④</sup>。进而言之，在其体系性著作被译介过来之前，这篇写作于1978年的纲领性论文，恐怕并非如有学者所说的“未引起实质性的反响”<sup>⑤</sup>，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那些无缘识见英文原本的内地学者窥见蠡测，是伊瑟尔为了与当代文化诗学之学术浪潮相呼应而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参考文献。顺便补充一下，现今鼎鼎有名的《新文学史》，是20世纪60年代为适应读者反应批评的崛起勃兴而特意创办的学术刊

①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顾建光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69-71页等。

②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顾建光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99页等。

③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顾建光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05页等。

④汪正龙：《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文学虚构理论及其意义》，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第29页。

⑤伊瑟尔、金惠敏：《在虚构与想像中越界——〔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访谈录》，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第170页。